红 学 通 史

陈维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 者 简 介

陈维昭，男，1960 年 11 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市人。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职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著有《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等学术专著 5 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　　录

序…… 黄　霖　1
绪　论…… 1
第一节　伟著《红楼梦》…… 1
第二节　显学“红学”…… 2
第三节　本书的史学观念与描述立场…… 4
一、何谓“通史”…… 4
二、解释学视界与学术史描述…… 5
三、红学的历史阶段性…… 11

第一编　1754—1901 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19
第一节　早期的两个读者圈…… 19
第二节　程本时代的红学…… 20
第三节　关于作者与版本的初步记述…… 23
第四节　《红楼梦》初涉重洋…… 24
第二章　价值关怀与文艺学批评…… 27
第一节　家族意识与“冷热金针”…… 27
第二节　“情痴”主题与色空观念…… 31
第三节　维护儒家正统与批判道德堕落…… 37
第四节　文艺学批评…… 41
一、《红楼梦》与传统文章学…… 41
（一）生命化文章观…… 42
（二）简约原则…… 45
（三）叙事修辞…… 47
（四）文学写实、史学实录及叙事法…… 51
二、影子说…… 53
第三章　本事、作者和版本的记述与考证…… 60
第一节　本事考证：索隐红学的萌芽…… 60
一、本事批评模式与索隐红学…… 60
二、周春的索隐范式…… 65

三、其他的索隐 …… 67
第二节 关于作者的记述 …… 70
一、关于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 …… 70
（一）关于曹雪芹家世 …… 70
（二）关于曹雪芹的生平 …… 72
二、《红楼梦》的作者、原始作者和写定者 …… 74
第三节 关于版本的记述与研究 …… 78
一、关于版本流变与成书过程 …… 78
二、续书、旧稿、佚稿和旧本问题 …… 83

第二编 1902—1949 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 93
第一节 文学革命与现代红学 …… 93
第二节 本事考证的新态势 …… 96
第三节 “新红学”的诞生与“新红学”的本质 …… 96
第四节 红学史和文化传播的初步研究 …… 99
第五节 海外红学 …… 101
第二章 红学新纪元 …… 103
第一节 梁启超与功利主义批评 …… 103
第二节 王国维与哲学、美学阐释 …… 106
第三章 索隐红学的第一个高峰 …… 115
第一节 索隐红学与政治功利主义 …… 115
第二节 王梦阮、沈瓶庵与蔡元培的索隐 …… 116
第三节 其他的索隐红学 …… 122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红学 …… 128
第一节 《红楼梦》的社会政治阐释与写实主义 …… 128
一、社会政治阐释 …… 128
二、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 …… 134
第二节 胡适与“新红学”派 …… 141
一、“新红学”的本质：实证与实录合一 …… 141
二、“新红学”的知识谱系 …… 144
三、“自叙传”与“曹、贾互证” …… 147
四、为“实录”观念确立学理依据 …… 156
第三节 鲁迅小说史范式中的《红楼梦》 …… 160
第五章 《红楼梦》的文学性研究 …… 168
第一节 回归文学性的立场 …… 168

第二节　文学性研究…… 175
第三节　比较研究…… 180
一、影响比较研究 …… 180
二、跨文化比较 …… 184
第六章　作者研究…… 190
第一节　家世与生平研究…… 190
第二节　《红楼梦》著作权研究…… 197
第七章　版本研究…… 200
第一节　抄本研究…… 200
一、有正本研究 …… 201
二、甲戌本研究 …… 204
三、庚辰本研究 …… 208
四、己卯本研究 …… 209
五、脂砚斋研究 …… 210
第二节　佚稿与“旧本”研究…… 212
第三节　刻本研究…… 218
一、刻本的基本研究 …… 218
二、后四十回研究 …… 221
（一）作者 …… 221
（二）价值评价 …… 223
第四节　成书研究…… 226

第三编　1949—1978 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231
第一节　大陆红学的三个阶段…… 231
一、批俞运动与评红运动 …… 232
二、实证研究 …… 233
三、红学资料的整理、编选和刊印 …… 239
第二节　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 …… 242
第三节　海外红学的迅猛发展…… 247
第二章　批俞运动与评红运动…… 254
第一节　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256
第二节　李希凡、蓝翎的现实主义阐释 …… 259
一、党性立场与《红楼梦》的倾向性 …… 262
二、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 …… 265
第三节　阶级分析与农民说、市民说 …… 26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官方定论 …… 268
二、论证模式 …… 269
第四节 评红运动 …… 276
第五节 对机械社会学的批评 …… 280
第三章 红学史反思 …… 286
第一节 李希凡、蓝翎的红学史批判 …… 286
第二节 海外的红学史反思 …… 290
第三节 余英时的意义及其负面影响 …… 295
一、余氏的红学观点及其意义 …… 295
二、余氏的论证策略 …… 297
三、误解与误导 …… 301
第四章 多维视野中的红学 …… 304
第一节 《红楼梦》的艺术品鉴 …… 304
第二节 跨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 …… 318
第三节 哲学、宗教、寓言、心理分析等维度的阐释 …… 324
第四节 叙事学研究 …… 336
第五节 海外索隐红学 …… 338
第五章 作者研究 …… 342
第一节 作者生平研究 …… 342
一、曹雪芹生平及生卒年研究 …… 342
二、相关“文物”研究 …… 349
（一）“曹雪芹”画像 …… 349
（二）“曹雪芹”佚著与遗物 …… 351
（三）“曹雪芹”故居 …… 357
第二节 《红楼梦》著作权研究 …… 357
第三节 作者家世研究 …… 362
一、家世研究 …… 362
二、曹锡远祖籍研究及其盲点 …… 367
（一）“丰润说”的集大成者周汝昌 …… 368
（二）“曹锡远祖籍辽阳说”的产生 …… 370
第六章 版本研究 …… 374
第一节 诸抄本研究 …… 374
一、甲戌本研究 …… 374
二、己卯本与庚辰本研究 …… 380
三、三戚本与蒙府本研究 …… 383
四、三评本与“立松轩”研究 …… 387

五、甲辰本研究 …… 388
六、杨藏本研究 …… 391
七、靖藏本研究 …… 397
八、列藏本研究 …… 399
九、郑藏本与舒序本研究 …… 401
第二节　佚稿与脂砚斋研究 …… 402
一、佚稿研究 …… 402
二、脂砚斋等批者的身份研究 …… 409
第三节　刻本研究 …… 413
一、程本的版次及其关系研究 …… 413
二、后四十回研究 …… 421
（一）作者问题 …… 421
（二）价值评价 …… 427
第四节　成书过程研究 …… 431
一、旧稿问题研究 …… 431
二、版本源流研究与张爱玲的意义 …… 433
（一）清晰流变图的探寻 …… 433
（二）识小辨微与张爱玲的意义 …… 437

第四编　1978—2003 年的红学

第一章　概述 …… 443
第一节　《红楼梦》意义阐释的多元化时代 …… 443
第二节　红学反思 …… 444
第三节　红学的普及化与大众化 …… 448
第四节　新时期的新索隐 …… 450
第五节　考证红学的鼎盛时代 …… 451
一、曹学的辉煌历程与红学的畸形格局 …… 451
二、版本研究的建构与解构 …… 454
三、探佚红学的脍炙人口与基本悖论 …… 457
四、《红楼梦》文献资料的整理 …… 459
第六节　海外红学 …… 464
第七节　红学的学术体制与学术活动 …… 466
第二章　新方法思潮与红学多元化 …… 468
第一节　社会政治诠释的余波 …… 468
第二节　实践哲学·新方法思潮·红学多元化 …… 474
第三章　《红楼梦》的文艺美学阐释 …… 478

第一节 文学感性与《红楼梦》阐释的美学立场…… 478
一、现实主义与文学感性 …… 478
二、新人性观与《红楼梦》审美判断 …… 484
第二节 《红楼梦》审美阐释…… 491
第四章 现代主义思潮与红学的价值转换…… 503
第一节 主体性哲学与《红楼梦》的价值阐释…… 503
第二节 多元的新方法实践…… 516
一、心理批评与神话批评 …… 516
二、比较研究 …… 531
（一）影响比较研究 …… 531
（二）翻译与跨文化比较研究 …… 537
1. 翻译与文化个性 …… 537
2. 文化价值形态比较 …… 541
第五章 红楼文化研究…… 546
第一节 《红楼梦》与传统精神文化的关系研究…… 548
第二节 《红楼梦》的制度态文化研究…… 553
第三节 《红楼梦》的物质态文化研究…… 561
第六章 《红楼梦》的叙事学研究…… 565
第一节 叙事学的概念序列…… 565
第二节 《红楼梦》的叙事学研究…… 566
一、《红楼梦》叙述声音研究 …… 567
二、《红楼梦》叙事结构研究 …… 574
三、《红楼梦》叙事修辞研究 …… 576
第七章 清代《红楼梦》批评的研究…… 584
第一节 政治立场的反思…… 586
第二节 现实主义、美学和叙事学视角的梳理 …… 588
第三节 形式研究…… 593
第八章 索隐红学的新发展…… 599
第一节 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 599
第二节 索隐红学的新定位…… 605
第三节 索隐的文学化与大众消费化…… 608
第九章 后现代情境中的《红楼梦》…… 613
第十章 红学的学术史研究…… 624
第一节 “红学三十年”的反思…… 624
第二节 周汝昌的“红学”界定与俞平伯的反省…… 626
一、余英时的误导 …… 626

二、周汝昌的“红学”界定与“新红学”的极致 …… 628
三、俞平伯的红学反省 …… 635
四、其他的红学反思 …… 639
第三节　红学史专论 …… 644
第四节　红学分支的学术史研究 …… 653
第十一章　作者问题研究 …… 657
第一节　作者生平研究 …… 657
一、曹雪芹生卒年研究 …… 657
二、生平与相关“文物”研究 …… 663
（一）“曹雪芹”画像 …… 663
（二）“曹雪芹”佚著和遗物 …… 665
（三）“曹雪芹”故居 …… 669
（四）“曹雪芹”墓石 …… 672
第二节　《红楼梦》著作权与原始作者问题 …… 673
第三节　曹氏家世研究 …… 681
一、家世研究 …… 681
二、“曹锡远祖籍问题”大论战 …… 687
（一）“辽阳说”的迅猛发展及其难题 …… 688
（二）“丰润说”与“新丰润说” …… 690
小结 …… 693
第十二章　版本研究 …… 696
第一节　抄本研究 …… 696
一、诸抄本的基本研究 …… 696
（一）甲戌本“凡例”研究 …… 696
（二）己卯本与庚辰本研究 …… 700
（三）三戚本与蒙府本研究 …… 706
1. 三戚本与蒙府本关系研究 …… 706
2. “立松轩本”研究 …… 710
（四）甲辰本研究 …… 714
（五）杨藏本研究 …… 715
（六）靖藏本研究 …… 720
（七）列藏本研究 …… 723
（八）郑藏本与舒序本研究 …… 727
（九）北师大本研究 …… 730
二、成书过程研究 …… 732
（一）旧稿问题 …… 73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清晰流变图与辨微识小 …… 738
三、佚稿研究 …… 750
（一）佚稿研究概况 …… 750
（二）“探佚学”演绎机制的逐步建立 …… 752
1. 映射机制与结构论 …… 752
2. 映射机制与章法理论——中国人的叙事学 …… 755
（三）佚稿研究的几大问题 …… 758
1. 全书总回数 …… 758
2. 主要人物结局和贾府命运 …… 760
3. 情榜 …… 762
4. 其他人物结局研究 …… 763
四、脂砚斋等人的身份研究 …… 765
第二节 刻本研究 …… 767
一、关于程本版次的讨论 …… 767
二、后四十回研究 …… 776
（一）作者 …… 776
（二）价值评价 …… 782
第三节 脂、程关系研究 …… 786
一、李知其评脂、程两系 …… 788
二、宛情的《脂砚斋言行质疑》 …… 791
三、欧阳健辨伪录 …… 792
（一）脂本之伪 …… 793
（二）脂砚斋与脂批之伪 …… 799
（三）相关材料之伪 …… 802
（四）其他研究者的反应 …… 806
结语 …… 812
后记 …… 813

序

黄　霖

“红学”，可说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中最“红”级的一门学问了。研究人才之广，发表论著之多，所造声势之大，自《诗经》、《楚辞》而下，至《三国》、《水浒》之类，恐怕都无法望其项背。可我却一向对《红楼梦》提不起兴趣，一直没有想探个头进去看个究竟，只是在“红学”的门外踯躅、观望和看看热闹而已。如今，维昭将一部百万余字的《红学通史》放在我面前，嘱我写序，真叫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犹豫再三，还是从我最初得知他写成这部书时的印象说起吧！去年，他对我说，完成了这样一部书，正在联系出版。当时，我没有见到书稿，不免心存疑惑：因自1966年潘重规先生的《红学五十年》起，特别是1980年相继出版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与韩进廉先生的《红学史稿》以来，后又有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刘梦溪先生的《红学》、欧阳健先生的《红学百年风云录》、白盾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史论》、维昭他自己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以及伊藤漱平先生的《日本研究红楼梦小史》之类的论著。这些有关红学史方面的书稿，虽然还不能说已林林总总，却也可以称得上是为数不少，真不知维昭他当下还想写些什么？还能写些什么？

如今，一打开他的目录，疑云顿释，深以为他确实有东西写，而且有必要写。

这倒不是说，前贤所著不行，而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著作。像郭豫适先生二十余年前的两部著作，我都反复拜读过，十分佩服。它们无疑是有开风气的作用，解决了不少问题，为后来的红学史研究铺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红学研究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永远有它们应有的地位。但像郭先生的著作，早孕育于上世纪60年代，即使后加修改，到80年代才出版，不论其对象的确定、材料的选择，还是观点的运用，难免要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有一些该写的没有能被写进去，有一些该写得充分的却并没有被写得充分。至于像潘重规先生的《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一类著作，也在他的学术观点指导下，将“红学”圈定在某一范围内，显然有许多方面没有纳入他的视野。其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也都是有选择，有“重点”，包括在我后来主持编写的《中国小说研究史》中，许建平先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写“红楼梦研究史”，但其覆盖的面还是嫌窄，许多问题还没有照顾到。这些，或许就是促使维昭他要另写一部红学史的第一个由头吧。至于第二个由头，恐怕就在于考

虑怎样与时俱进，以一种更新、更好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一部红学史了。

于是，他撰写这部红学史，一是强调了“通”；二是强调了他的“解释学立场”。

关于“通”，维昭自己在《绪论》中说：“从‘纵’的方面看，它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它要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接着，维昭又说：“通观者，不仅在于对研究现象的整体考察，更在于对红学发展的内在律动以宏观把握。……所谓内在律动，对于《红楼梦》的意义诠释领域来说，是对各种意义生成的内在依据的把握；对于《红楼梦》的事实还原领域来说，则是对研究命题的捕捉与持续性关注。”这就是说，他的“通”，包括纵与横，内与外，中与洋，都要力求通。换一句更朴实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要全面的把握。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既要有阔大的胸襟，也要有充实的积累。胸襟阔大，就不能以我为主，多立疆界。一部红学史，就应当把有关红学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编史者的视野。假如将有关《红楼梦》的文献研究视之为繁琐无用之学而摒之于门外，固然不妥；但反过来惟将文献研究认作是正宗的学问，也明显不通。本来，学问之道，各不相同。有的走考订、训诂之路，也有的行批评、欣赏之道；有的是为了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社会的功用，有的是为了求实字句的原义、故事的来源、作者的面目、版本的真伪；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学问，哪一种是假学问。只有将所谓“内学”与“外学”、“硬学”与“软学”（我将实证类的姑称为“硬学”，评释类的称之为“软学”）都当作“学”，才能建构起一部完整的学术通史。维昭在这方面就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熔为一炉的策略，这是一种编史者应有的气度，这也才使他有可能走上编写一部通史的通途。上了这条路，必须下工夫。工夫才是使他最后能走通这条路的根本保证。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维昭就学于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1984—1987 年）就开始接触《红楼梦》。1990 年，真正下工夫研究，第一篇论文《〈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91 年第 2 辑。1991 年至 1995 年期间，正是红学界各种新说叠现的时期，进一步引发了他的研究的兴趣。但同时他觉得争论的各方假如能摆脱就事论事的习惯，放开视野，去认真探究各位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所处的文化时空，就可能会更好地发现问题的实质。这就使他更致力于将 20 世纪的各种红学现象放在整个学术史的背景上，着重去分析其“之所以然”，而不满足于对各种红学观点的是是非非的点评上。沿着这一思路，他写出了《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一书。假如说，于 1996 年撰就、2000 年出版的这部专著是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在这基础上，他仍孜孜不倦地在“通”的道路上前进，力求网罗所有的材料，继续不断地思考问题。1999 年他来复旦攻读博士学位，这给他进一步搜集红学史的材料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所撰写的六十万字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研究史》虽然并未直接与《红楼梦》挂钩，但也磨练了他编写学术史的眼光与方法。2002 年毕业后，他心不旁骛，专志红学，一鼓作气，完成了这部大著。因此，前

后算来，维昭在红学史上所花的工夫，也有十多年。曹雪芹当年说他写《红楼梦》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如今维昭的这部通史虽还不能说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却也可以说是“字字通处见工夫，十年辛苦不寻常”。工夫，就是“通”的不二法门。他的“通”就是建立在工夫之上。所以综观这部《红学通史》，尽管在纵与横、外与内、中与洋等各个方面不能说已网罗无遗，但应该说，该说的问题都说到了。一个“通”字，当之无愧。

维昭这部通史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明确地提出解释学立场”，强调“任何叙述都已经是一种评判”，认为“只有依靠这种解释学立场（而不是客观化假定）才能够真正把握《红楼梦》研究史的内在律动”。这种强调编史的当代阐释性，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在中国也开始比较流行的一种史学编纂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一个角度来看当然是真理。这对于一味强调编史的客观性无疑是一种补充与进步。但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一切叙述与阐释都还是要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否则就不成为历史著作而就成为文学创作了。所以，编史究竟是强调解释为先，还是主张以客观为重，学术界实际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在最近出版的一些学术史著作中，首先强调“客观性”的也不在少数。前几天，在一次学术会上，我就听到某位朋友说，他们准备编一部只摆客观材料，不作直接评判的文学史，让读者或学生自己去加以思考。当然，那些材料如何摆？摆些什么？实际上也都倾注着编者的观点，但它毕竟与“解释学立场”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这两种编史的路径，孰优孰劣，我想是无法笼统地加以评判的。应该说，它们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关键是看你如何实际运用。维昭在这部史中，以解释为重，就能对一系列的红学现象，特别是在观点与方法的变化、发展方面尤能作出十分细致而恰当的辨析与评价。就 20 世纪的红学史中，如何评价胡适、李希凡与蓝翎、余英时的红学观点，可能是最为关键。维昭在解释胡适的“新红学”时，抓住了“实证”与“实录”两个方面，努力追溯其学术渊源，自有所见。他认为胡适从传统的考证基础上，又注入了现代的“科学方法”、“实验方法”，使红学乃至整个小说的考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他所提倡的“自传说”，使 20 世纪“贾曹互证”的思路也一直绵延不断，而“自传说”的根柢实际上还是与传统注经与史学的实录观念大有关系。这就比较清楚地辨析了胡适“新红学”具有合理的一面的同时，又有其反科学的一面，不能笼而统之地赞同或反对。“新红学”之后盛行一时的李希凡他们的红学观，“文革”后往往被一些人称之为“斗争红学”而一笔否定。维昭在指出李希凡他们的文章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之外，主要将其定位在“现实主义阐释”方面，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尽管存在着‘上纲上线’的措辞，但是，它的讨论是严肃的。它的真正意图是对延安时期以来革命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一番实践。这与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文艺批评的价值体系的转换历程是步调一致的”。在论析他们的“红学史批判”

时，也认为他们对脂砚斋、王国维，一直到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批判尽管在总体上“主要采用了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有失公允，但还是有分析地指出李、蓝在否定前人的同时又对批判对象各有一定的肯定，并指出这正是李希凡他们从文艺反映论出发而“对传统文艺观之狭隘与肤浅之不满”，自有其可取之处，并说：“这种文艺观强调了文艺在历史批判上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处于民族救亡时期或政治斗争激烈时期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最具合理性的文艺观。”但当民族救亡和政治斗争的语境淡化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反映论文艺观迷失了创作主体的审美建构作用，人们就会呼唤表现论文艺观。正在此时，余英时的“新典范”论在“文革”之后异军突起，影响了一时的红学天地。维昭对余英时的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分析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细致地辨析了它的积极意义、理论缺陷与负面作用，极具针砭意义。

当然，站在“解释学立场”上，如上对于红学史上的一些观点与方法方面的问题，往往容易一展身手，而对于那些实证性研究方面的问题，就相对较难措手。然而，维昭在后一方面，也并没有显得无所作为，仅以一般的“综述”来敷衍了事，而也努力地介入主体的领悟、解释与评判。比如“曹雪芹祖籍”之争，一以“丰润说”，一以“辽阳说”，双方一次又一次的交锋，常常牵动了整个红学界和新闻传媒界，令人眼花缭乱。维昭在仔细梳理、辨析他们的主要观点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尤注意将一些争论的“泡沫蒸发干净”，去考究他们争论的症结与盲点。他尖锐地指出，两说发生争议的实际上不是曹雪芹的祖籍，而是曹锡远（或曹振彦）的祖籍。曹雪芹的祖籍问题，胡适于 1921 年即已解决（他认为曹雪芹祖籍辽阳），这一观点一直为学界所普遍认同。30 年代，李玄伯根据新发现的曹家资料，开始探讨曹寅的祖籍。至 50 年代，出现了曹寅祖籍之争。从此之后，发生异议的不是在曹雪芹的祖籍上，而是在曹锡远的祖籍上。因此，他特意用了诸如“曹锡远祖籍研究及其盲点”、“曹锡远祖籍辽阳说”、“曹锡远祖籍问题大论战”之类的题目来加以表述。至于两说的“盲点”，他则作了如下的结论：

> 持“辽阳说”者可以证明曹雪芹祖籍在辽阳，但不能证明辽阳曹的祖籍不是丰润，因为在曹锡远与曹智之间存在着一个持“辽阳说”者所不能说清楚的盲点；持“丰润说”者可以证明曹端广的后人入辽，但它不能证明这位入辽的后人是如何与曹锡远挂上钩的，这是“丰润说”的盲点。也就是说，“辽阳说”与“丰润说”存在着相同的盲点。在辽东这一点上，“辽阳说”表现为“来无影”，“丰润说”则表现为“去无踪”。

再如有关《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也是错综复杂，红学家们的考辨层出不穷，维昭在梳理、绍介之时，虽难以一一指陈得失，但他对这些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其第三编第六章专论 1949—1978 年的“版本研究”时，于第四节中专门安排了一小节“版本源

流研究与张爱玲的意义”，从“识小辨微”之处，也可见其独立的眼光。张爱玲本不是一个正宗的版本学家，也没有对《红楼梦》版本的演变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但维昭恰恰在这个小说家的杂乱无章的谈论中窥见了重要的版本意义，认为“张爱玲终于感悟到《红楼梦》版本流变的复杂性，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是指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提出《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不能以“本”为单位，而应该以回、段、句为单位，各版本的时间先后在不同的回、段、句上，其顺序是不一样的。张爱玲的这一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尽管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意见，但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面对着这样的情况，维昭则坚信“她的提示与研究为下一时期的《红楼梦》版本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视点”，作出了自己独立的解释，给予很高的评价。

总之维昭的这部史，不是采取旁观式的描述，而是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对一部红学史在力求详细描述的基础上，努力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上去透视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作出一个编史者独立的解释与评判，目光敏锐，态度鲜明，读来令人佩服。当然，肯定也有人对有的解释不但不佩服，而且可能会竭力反对，这也是十分正常的。学问之道，总是在辨难中不断发展。它只要能引发人们的兴趣和深思，这就是成绩。这或许也就是“解释学立场”所带来的魅力吧！

由此“解释学立场”而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我想，强调解释，无非是强调著史者的主体性和著史的时下性；或可以合而论之，则是时下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发挥，还是有不同的发挥套路的。比如，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这就是在主体阐发的时候，究竟是立足在当下的某种观念之上，还是立足在红学史的事实之上？我们曾经读到过不少明确用某一种理念去解释一部文学史的著作，比如，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用“阶级论”，用“儒法斗争”，用“人性论”等等，这些著作的成败得失，大家都已比较清楚。就从红学研究来说，王国维用的是叙本华理论、胡适用的是潜史学实录理论、李希凡用的是反映论、余英时用的是表现论，大家像走马灯一样将《红楼梦》这部小说打扮成各种各样的小姑娘。尽管后之视前，总以为今能胜昔，但每一种理论在当初对《红楼梦》作阐释的时候，也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市场。即使是索隐派，他们实际上也是根据某一理念在阐释《红楼梦》，不同的只是他们用了一些材料来“阐释”他们的一种观点罢了。他们与王国维、李希凡乃至余英时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对《红楼梦》作一种阐释，只是索隐派用的是不同的观点与手段而已。另一种立场，则不是从主体的某一理念出发，而是立足在文本之上，从事实出发，是什么问题，阐释什么问题。比如，对胡适，不是先从什么唯心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反动，或者是反映论、表现论等等理念去套，而是从胡适具体的考证和阐释出发，从文化时空中去辨析他这一套东西产生的缘由，以及他的科学性与反科学性的不同成分和在红学史上产生的影响等等，这种阐释，似乎既不失编史者的主体性，又较能契合解释对象的客观性，维昭所走的路，似乎是后一种，即没有

用一种先验的理念或模式去阐释研究的对象，而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去解释它的来龙去脉、本质特点与成败得失等等，这就使他的这部通史在保持自己主体性的基础上具有独特的个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只有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去解释，才能真正形成自己学术著作的鲜明个性。

强调主体性、阐释性，这里还有个史德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去阐释，就要坚持传统秉笔直书的精神，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有什么认识，就写什么认识，不因为遇亲者而谀之，遇疏者而略之，遇强者而屈之，遇弱者而欺之。这一点，说时容易做时难。眼下读到的不少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往往是遇亲则谀，遇疏则略，见位高者一味吹捧，视无名者不屑一顾，写出来的是一笔糊涂账。维昭在当前的红学界，还只能说是晚辈后生，一部通史中，涉及到的名家前辈知多少，有的人还是老虎屁股不好碰的，他都能坚持直道，该褒的褒，该贬的贬，该详的详，该略的略，该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而对于红学界的一些初出茅庐之辈，则能一视同仁，书中的不少论点即采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之中。说得抽象一点，也就是说阐释的主体性还是要服从于客观性；而要尊重客观，第一是要有直道。有了直道，第二还是要讲恕道。所谓恕道，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设身处地；用理论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要讲历史主义。时代是在不断发展，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前人的认识难免粗浅，也往往不合后人的口味，但在粗浅之中往往蕴含着伟大，不同的口味中也自有不同的奥妙，不可轻率地以今律古，苛求前人，或者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想当然地苛求他不懂的另一文化环境中的人。在这里，我注意到维昭对钟敬文先生考察索隐红学意义的评价颇高，认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是当时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主流。从这一语境出发，钟先生认为蔡元培之写作《石头记索隐》，其“内在的、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受当时中国社会反清朝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潮流的驱使，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的著者，要用自己的新观点去解释过去的文化成果，并使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服务”。相比之下，胡适把《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实际上是使文学评论思想倒退。至于侠人等人对《红楼梦》的民主主义的评论发表之后，到文化革命的新时期，这一类评红者往往把视线集中在家庭和婚姻问题上(《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3 期)。维昭认为，钟先生“从时代的文化旨趣、批评旨趣的角度出发，于是对红学史的评价就能一针见血、高屋建瓴，深刻地揭示了红学批评的本质。与那些‘旧红学’、‘新红学’的简单化做法相比，钟氏的视点才是真正揭示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只可惜这种平实的学术史探讨在这一时期里昙花一现”。当然，对于索隐派以及钟先生的这一观点自可讨论，但这里能对不少人认为过时的索隐派、旧红学不作简单的否定，而是能放在历史的背景上给予应有的评价就令人敬重。这就是讲恕道，能历史地分析前人的功过得失。编史讲史德，既要讲直道，又要讲恕道，似乎有点矛盾。其实这两者的本质特点就是一个，尊重客观，尊重

实际。所以归根到底，讲阐释，强调主体性，与讲究客观性是并不矛盾的。与直道和恕道相关的，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史德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红学史上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观点介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代似乎并不突出，而在20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在讲学术史时，恐怕是一个难以回避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我想编史者也应该用直道与恕道来对待，也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实事求是。过去把学术与政治捆绑得很紧的历史教训应该认真吸取。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编学术史，似乎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要还是高举“政治第一”的标准来对待一切学术问题。能否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对待，多作一些具体分析。而且，即使是对政治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不是所有为政治服务的学术都是错误的。学术毕竟还是要放在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坐标上加以衡量的。这样的话，像李希凡、蓝翎他们在整个红学史上的功过还是可以仔细斟酌的。后来有的高举反对“斗争红学”、“政治红学”旗号的人，实际上本身就是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的，政治意识强得很。对于红学史上的这类现象，我们必须有清醒的、独立的头脑。不管风云变幻，编史者必须讲史德，凭良知，从事实出发去描述，去阐释，去评判。

古人论编史重才、学、识。假如说维昭所求的“通”，主要关乎学；所重的“解释”，主要关乎识；至于维昭之才，我想也不必多说，一部《红学通史》放在面前，读者自可观之。我多说了几句“德”的话，也是从章学诚所说的“文德”而来。不过，从当前编学术史而言，似乎讲“史德”还是最为要紧，假如一味跟风，跟势，跟上，或者抱着几个小兄弟，操纵着几家传媒，一心考虑如何包装、炒作，还有什么学术良心可言，还有什么学术良史可读？当然，作为一部学术史，最后还是要以识、学、才来衡量其优劣上下。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今我又加了一个德，怎敢说维昭这部《红学通史》在德、识、学、才四个方面都能兼长！不过，有一点我是敢说的：他正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门外谈“红”，杂无章法，最后竟谈到了编学术史的德、识、学、才，这或许是由于我近几年来常看到、常想到的一些问题而引发的吧！啰唆几句，权作维昭《红学通史》的序，只是希望笃志好学、淡泊名利的维昭，能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当然，这也是我所追求的方向。

2004年8月16日
于苏州河畔恒安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